



陈独秀

汪精卫

吴樾

核心提示

辛亥革命前的暗杀潮



徐锡麟

黄复生

秋瑾

在历史悠长的中国,从来没有哪一个百年会像这一个百年般惊心动魄、脱胎换骨,会有如此奇迹翻天覆地的巨变。而辛亥革命前10月10日武昌城的几声枪响,一举洞穿并开启了这“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。在革命前夕,暗杀成为一种潮流,蔡元培、章士钊、鲁迅、刘思复等人都有过一段热衷于试验炸弹、准备暗杀的经历。在上个世纪之交,他们代表了一大批对时局感到苦闷而又偏好激烈手段的年轻人。汪精卫和黄复生先后对清朝重臣实施了震惊全国的暗杀。革命后,暗杀者成为掌权者,暗杀时代”就此画上了句号。

1905年: 吴樾开启“暗杀时代”大幕

1905年底,在安徽芜湖,陈独秀接到了朋友从北京发来的信。信中有一个他早已猜到了的坏消息:以炸弹谋杀五大臣的刺客,正是他的同乡好友吴樾。事实上,陈独秀和吴樾属于同一个暗杀团体,吴樾的暗杀行动,陈独秀也参与了策划。有人认为,吴樾使用的炸弹,是陈独秀和浙江人蔡元培共同制作的。这些炸弹性能不佳,结果发生了意外,是吴樾抱憾而死的主要原因。

尽管陈独秀从来没有亲自实施过暗杀行动,但他在暗杀团体中的资历要比吴樾老得多。现在很少有人知道陈独秀还曾有这样一重身份——老资格的刺客预备队员。但在陈独秀的年轻时代,很多后来非常著名的历史人物,都曾经狂热地拥护过暗杀。蔡元培、章士钊、鲁迅、刘思复等人都有过一段热衷于试验炸弹、准备暗杀的经历。

因为这群人的存在,暗杀行动不会因为一次失手而终止。吴樾的失败只是揭开了一个暗杀时代的大幕。

吴樾的目标是清廷的五位重臣——镇国公载泽、户部侍郎戴鸿慈、兵部侍郎徐世昌、湖南巡抚端方、商中丞绍英。他们受慈禧太后的委托,出国考察立宪,为中国实施政治改革做准备。

属意立宪改良的人士翘首以望。5位大臣动身的时间是1905年农历七月二十六,出发之日,人头攒动,热闹非凡,谁也没想到,吴樾在自己的包袱里带了一枚炸弹。

19世纪中期之后,动荡的局势也提供了更多的机会,没有功名的人也有机会通过战功、经营洋务或编练新军做官。对吴樾这种人来说,有“功名之念”是非常自然的事情,但时代的潮流把他卷离了原有的位置。正是在新式学堂读书期间,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。先是在康、梁的影响下,他从一个热衷功名的年轻人,变成立宪主义者;又在革命党人所办的报刊影响下,从立宪主义者变成民族主义者。

这之后,吴樾过着一种近乎流浪的生活。他交待,如果他在暗杀行动中遇难,就将遗著托付给陈独秀。这是一部两万多字的著作。他在其中表达了对时局的看法,其中大多数篇幅都在讨论暗杀的必要性以及手段。

起初,吴樾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谋杀的对象是时任江宁将军、陆军部尚书的铁良。铁良是满族亲贵的能臣,代表了异族统治的利益、责任感和能力。吴樾认为,相比起刺杀慈禧太后,接近铁良的机会要多得多——但事实并非如此。1904年冬到第二年春,他两次试图暗杀铁良,都没有成功。1905年夏,他来到北京,也是为寻找接近铁良的机会。

在北京,吴樾很快和暗杀团体接上了线,不久就参加了陈独秀的老朋友杨笃生组织的北方暗杀团。当他提出暗杀五大臣的计划时,不少同志不以为然,加上此计划危险重重,结果几乎没人愿意和他一起实施。

但暗杀计划最终得到了北方暗杀团创始人杨笃生的支持。杨笃生的另一个身份是五大臣宪政考察团的翻译随员。他要随五大臣同行,所以了解考察团乘车的行动细节,这样就能为吴樾的行动提供指引。行动准备时间很长,可能有几个月之久。

五大臣出发这天,正阳门车站外人很多,五大臣乘坐的车厢另有装饰,称为“花车”,非常醒目。吴樾打扮成仆从模样,登上列车,准备混进五大臣所在车厢。在花车的门口,吴樾被卫兵所阻,双方拉拉扯扯的时候,列车正接驳行李车厢,行李车厢的惯性推动客车剧烈晃动,引发了包袱中的炸弹。吴樾当场被炸死。五大臣仅受了轻伤。

吴樾事败身死,遗骸被带往家乡,埋葬在安庆郊外的大观山。暗杀没有就此消停,他的死反而激励更多年轻人走上这条道路。两年后,在安庆,浙江人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,一击得手,举国轰动。



1912年,旧金山华侨游行庆祝孙中山就任“临时大总统”。

1907年:秋风秋雨愁煞人

“暗杀时代”其实也是“改革时代”。1905年,侥幸逃过吴樾炸弹袭击的五大臣游历欧美十余国,回国后向朝廷提交了一份观察报告——其实是流亡日本的梁启超起草的。报告的结论是,必须实行君主立宪,进行政治改革。

对改革的目标,当然有不同看法。富国强兵是其一。端方告诉慈禧太后,立宪还能保证“皇上可世袭罔替”——天下还是爱新觉罗家的。在端方这样的掌权派、康梁这样的改良派和各地的立宪派士绅看来,保中国和保大清并不矛盾,两者是一体的:只有改革才能保国,只有国家保住了,才能保住大清的统治;反过来,大清政权的延续,有利于社会稳定,降低改革的成本。

但孙中山、黄兴这样的革命家并不这么想。革命党人觉得,中国亡国灭种的最大危险,不是别的,正是清朝的统治。

比起吴樾的炸弹袭击来,徐锡麟的计划要复杂庞大得多。刺杀恩铭只是一个开头。杀掉恩铭后,他将策动会党起义,夺取安庆,并由此南下。作为呼应,秋瑾会同时在浙江起事,夺取杭州,然后溯江而上;按照计划安排,徐锡麟和秋瑾将在南京会师,革命党将掌握整个中国最富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——这个雄心勃勃的安排似乎是曾国藩战略的一个翻版,可惜省略了无数细节,也忽视了计划实施中可能出现的种种不测,最终根本没能展开。

但徐锡麟的行动仍然轰动了全国。在“暗杀时代”发生的所有暗杀事件中,徐锡麟刺杀恩铭无疑最有代表性:不但因为行动取得了成功,也因为整个计划功亏一篑。这次行动完美地验证了吴樾的理论:暗杀只是因,革命才是果。但是,要将暗杀的成果通过革命巩固下来,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徐锡麟很早就和会党有往来,加入了蔡元培组织的光复会。蔡元培、章太炎都能够在绍兴建立一个反满的基地,作为联络会党、策动反政府暴动的中心。具体的工作就落到了徐锡麟身上,地点就在徐锡麟创办的绍兴大通师范学堂里。

大通学堂创建于1905年,是一间训练兵操的民办学校。筹备时缺乏经费,蔡元培的弟弟蔡元康和徐锡麟准备抢劫钱庄,因为陶成章的反对而作罢,最终出钱的是徐锡麟一位有钱的朋友。为大通学堂去省城办手续的是陶成章。

徐锡麟办学时间不长。他有一个更大的计划,准备通过捐官的办法,混入官场,掌握一支军事力量。徐锡麟的第一步是到日本学习军事。

1905年冬天,徐锡麟带着家眷和一批

学生抵达日本横滨,浙江籍的留日学生纷纷前去迎接,孰料他已经在神户上了岸。

徐锡麟由神户乘车到东京,秋瑾在东京等候他们。秋瑾留给后世的形象是英风爽烈的“女侠”形象,但对徐锡麟夫妇关怀备至,亲自安排他们在日本的生活起居,就像在异国他乡重逢的邻家小妹。

徐锡麟在日本投考军事学校,但没有被录取,原因很可能是近视。他进过几所短期学校,先是学习日语,后来学习警察知识,但时间都不长,中间还因事回国一趟,在日本前后待了不到半年时间——这段镀金的经历至关重要。回国后,徐锡麟用朋友资助的钱捐了个道台。时任湖南巡抚的俞廉三是徐家的亲戚,把徐锡麟推荐给自己的孩子,安徽巡抚恩铭。徐锡麟随即被任命为安徽巡警处会办和巡警学堂的监督。

1906年,秋瑾步徐锡麟后尘回到国内。1907年初,徐锡麟带着两名学生赴安徽上任,走前将大通学堂托付给秋瑾,请她整顿学校的秩序。此后,安庆和绍兴之间的书信往来不断,商议于当年夏天,由徐锡麟刺杀恩铭,然后浙江和安徽两地的会党同时起事。

计划漏洞百出。浙江各地的会党根本无法协调行动。预定日期未到,好几个地方的会党蠢蠢欲动,引起了地方政府的高度警觉,两江总督端方随即查办此事,拿到的名单上不但有浙江党人,连打入安徽内部的党人姓名也在其中——其中就有徐锡麟本人,只不过用的是假名。

恩铭死于不慎,也死于对部下的信任。他居然把这份名单又交给了徐锡麟,让他主持查办。事已至此,徐锡麟来不及与秋瑾商议,仓促发动了暗杀。1907年农历五月二十六,恩铭前往巡警学堂参加毕业典礼,徐锡麟发表演讲后,和两名随从掏出枪,对着恩铭一番攒射。

重伤恩铭后,徐锡麟按计划带领学生前去占领军械库,但到了军械库,发现枪炮都不能使用。清军将他们包围起来,徐锡麟抵抗一阵后被俘。负责处理此案的是两江总督端方。徐锡麟在口供中说,他想杀的满人有恩铭、端方、铁良和良弼——都是满族中主张新政的当权派和改革派。

徐锡麟在安庆被捕,旋即被杀,恩铭的卫兵和侍妾残忍地分食了他的心和肝。在遥远的绍兴,秋瑾没能成功地发动暴动。徐锡麟的死讯传到绍兴之后,秋瑾的同志们劝她赶快离开,几次为她安排出走的路线,但秋瑾不为所动。她默默地坐在大通学堂里,一动不动,官兵破门而入,将她捕获。

1910年:汪精卫画上句号

和前仆后继的暗杀相对应的,是此起彼伏的暴动。规模较大的就有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、黄冈与七女湖起义,1907年的防城、镇南关起义,秋瑾和徐锡麟未遂的皖浙起义,1908年的马关山起义、河口起义,1908年,安庆的新军再次起义,1909年,广州的新军暴动,到1911年4月,黄兴亲自指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。

因为和梁启超论战而声名鹊起的汪精卫,起初觉得暗杀只是儿戏:如果杀几个官员就能逆转形势,推翻清朝,实现三民主义,革命不是太简单了吗?他提醒自己绝不要抱有这种偷懒的想法。然而他作为革命家名动天下,却是因为一起未遂的暗杀。他是这起暗杀的主谋,不但全程策划,而且准备亲自实施——可惜没有成功。

从瞧不起暗杀到亲自从事暗杀,汪精卫的转变和当时萧条的革命形势有关。1910年之前一连串的起义失败之后,很多同盟会的人都感到推翻清朝无望,灰心沮丧的情绪正在扩散,这加剧了同盟会内部的分歧。兴中会、华兴会和光复会的矛盾由来已久,对孙中山的“三民主义”,很多人觉得不过是画饼充饥。

汪精卫受不了这种讥讽。他下定决心,要制造一起轰动的大案,以提振同志的信心,将他们再次团结在一起。尽管同志都反对他去搞暗杀,孙中山更加着急,打电报要他放弃暗杀的计划,他还是一往无前,于1909年冬天潜进了北京。

汪精卫谋杀的对象,最后锁定载涛。此人后来成了宣统朝的摄政王,家住在什刹海边上,每天上下朝都要从一座小桥上经过。汪精卫和喻培伦、陈璧君等人在此踏勘多日,决定将一颗大号炸弹安装在桥下。

炸弹将由电话线引爆,汪精卫具体负责操作。炸弹是革命党人中的“炸弹大王”喻培伦亲手制作的。

埋设炸弹的过程一波三折。第一晚因为动静太大,引得附近一条狗狂吠不止,第二晚所带电话线又不够,都没有成功;第三晚动手的是黄复生和喻培伦,炸弹还没来得及完全埋好,不远处有个人打着灯笼走过来。黄复生恐怕事情败露,让喻培伦去通知汪精卫不要前来,自己躲在一棵树下观察。打灯笼的人到桥上看了看,若有所思的样子。黄复生决定撤退。炸弹太重,带不走,于是就地挖了个坑,将炸弹埋在坑里。

打灯笼的人事后交代,当晚他内急了要上厕所,发现桥下有挖土的痕迹,于是报了官——一起策划多时的惊天暗杀,就因为这种无厘头的理由提前败露了。警察从炸弹上的铁壳找到铁匠,又从铁匠那里摸出了汪精卫等人的行迹,最后一举将汪和黄抓获。

被捕后,汪精卫和黄复生争着为对方开脱,都自称主谋。对这两人的审判轰动一时,媒体大加渲染,北京城里尽人皆知。不过,汪精卫没有绝命,他和黄复生坐了一年多牢。武昌起义之后,清政府大赦党人,两人光荣出狱,再次轰动北京。汪精卫出狱后直接参与了南北议和——最传奇的刺客放下炸弹,就这样变成了政客。

当革命者成为掌权者,刺客变成政客,暗杀者成为暗杀对象,革命党人的“暗杀时代”,就画上了句号。(据《新民周刊》)

